

《新文学史料》

百期索引

许 馨◎编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新文学史料》百期索引

许 馨 编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史料》百期索引/许馨编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3

ISBN 978-7-81093-550-0

I. 新… II. 许… III. 文学史—期刊—索引—中国—1978~2003
IV. Z89: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2303 号

《新文学史料》百期索引

许 馨 编著

责任编辑 陆向军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56 千字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ISBN 978-7-81093-550-0

定价:19.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编辑说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8年创办了《新文学史料》季刊。二十多年来,它刊载了许多珍贵的、难以见到的新文学史料。它是全国唯一一份反映中国新文学历史和现状,集学术性、研究性、资料性为一体的史料性刊物,是海内外文学研究工作者十分重视、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型文学季刊。为了给研究工作提供方便,我们将其出版的100期所载史料及文物图片等,编制成这本索引。

一、本索引是资料性工具书。为了资料齐全,将《新文学史料》从1978年创刊号至2003年第100期所发表的全部文章和文物图片等,分为作家作品,社团·期刊·流派,史料,轶文轶事,来信·补正·考证,简讯,悼念,图片·手迹,其他等十大类,而每一类又根据内容分成若干小项。“作家作品”条目较多,为了检索便捷,按作家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二、本索引条目后的阿拉伯数字,前者是总期数,后者是页码。原刊2002、2003年共8期未注明总期数,依次应为94~101期。

三、本索引有些条目作了“互见”,如“作家作品”中一些条目,又见“社团·期刊·流派”等。

四、本索引的编辑工作是断断续续进行的,所以在分类编排方面肯定有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者

2007年3月

史料学建设的重要基地

——重读《新文学史料》100期

许 馨

家父从事中国新文学教学与研究四十多年，订阅收藏很多新文学期刊，可是他对《新文学史料》却情有独钟。我们做子女的，不论是学什么专业的也都喜欢阅读这本大型文学史料丛刊。每当它寄到时，我们都争着看。当收到第100期刊物的时候，父亲颇有感慨地说：“啊！都出到100期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他要我们将家藏的100期《新文学史料》重新读读，一定会有新的感受和收获。因而，近两年来，我将《新文学史料》100期重读了一遍，在重读中还常常与父亲讨论心得体会。

1

史料学建设的重要基地

—

《新文学史料》诞生在一个春风化雨的好时代。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以后，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举国上下、各行各业拨乱反正，势如破竹。知识理论界犹如沐

浴在春天的阳光雨露中。中国新文学研究，随着学术思想的进步，进行着自身的变革与发展，不仅不可能固守原有的一切定论，而且几乎对过去的一切结论，都在用新的视野、观念和方法重新思考、重新检验，力求还历史本来面貌。无疑，新文学研究领域要真正彻底地进行“拨乱反正”，不仅需要人的主观思想的解放，更需要大量客观真实的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新文学史料》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1978年秋，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它像肥沃土壤里孕育的良种，迎着春风春雨破土而出。它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本新文学史料的专业性大型丛刊。新文学研究工作者、高校师生以及广大新文学爱好者，无不为其的诞生而欢欣鼓舞。

我国文化史料工作，在古代就有良好的基础和传统。可是，由于自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我国一直处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对内争取人民解放的战争中，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解体和封建宗法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统治地位的动摇，封建时代编纂历史、保存史料的体制也陷入瘫痪或消亡，而新的编纂、保存史料的体制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再由于中国新文学一兴起就显示其反帝反封建的特点而受到封建统治势力的压迫和迫害，造成编纂、保存新文学史料的困难；加上极“左”文艺思想的影响与干扰，特别是“十年文革”，严重损毁和颠倒了新文学史料。因此，新文学史料工作出现了脱节现象和多种形式的空白，丧失一些珍贵史料、

颠倒一些重要史实。^[1]面对这种丧失史料、颠倒史实的状况，许多人深感焦虑！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领导立即决定抢救遗产，吁请老同志撰写回忆录。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筹备创办一份大型的文学史料期刊。197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任社长韦君宜，亲自带领编辑们拜访了茅盾等一些新文学老前辈、老作家，从宣传中央抢救遗产的决定，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为配合抢救遗产，筹备出版《新文学史料》，发表文学回忆录之类的史料文章，等等。一些健在的文学老人，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就驰骋文坛、饱经沧桑的文学前辈，对抢救新文学史料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于是，由韦君宜同志领导，在编辑们深入具体发动组织下，一些著名的文学老人不顾年老体弱多病，积极挥毫撰写亲身经历的文学回忆录。如从事革命与文学活动较早的茅盾，率先写出长篇文学回忆录（出版单行本题为《我走过的路》），在《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上头版头条开始发表，连载了33期，持续时间达八年之久。这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文艺界“拨乱反正”起到很好的积极影响。接着，《新文学史料》还陆续发表了冰心、巴金、老舍、沈从文、姚雪垠、张恨水、闻一多等一大批著名老作家的文学回忆录或传记。这些文学回忆录或传记，无不给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新文学史料》与读者见面后，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对新文学史料领域进行了艰苦的拨乱

反正，将被人随意打扮、凌辱、作践的新文学史实辨正过来；将丧失、损毁的新文学史料，尽量抢救回来；将藏在活人头脑里的新文学史料，尽量保存下来……一句话，它以抢救、辨正史料，丰富新文学史料宝库，还历史本来面貌为己任。在当时的形势下，《新文学史料》这样做，就像一艘破冰船在艰难地驶往彼岸。幸运的是，迎接它的是改革开放的人间春天。可以说，它在初春中孕育而生，在阳春三月里生长。在编者、作者、读者的共同浇灌下，它从诞生的那天开始，就一年年茁壮地成长起来了。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如今它已茁壮成长成为抢救、建设中国新文学史料的一块重要基地。

二

《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上的《致读者》写道：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也是一部披荆斩棘、充满斗争、不断前进、波澜壮阔的历史。把这个历史时期的生动丰富的材料收集起来，以备今人和后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研究，予以科学的总结，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编辑出版了《新文学史料》丛刊。这个丛刊以发表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为主，也刊登这个时期有关文学论争、

文艺思潮、文艺团体、流派、刊物、作家、作品等专题资料，刊登调查、访问、研究、考证，还选登一些过去发表过的比较重要但现在不易看到的材料和文物图片，以及当前有关文学史工作的动态、报道和对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介绍、意见等。

编者还在创刊号上的《征稿启事》中写道：“恳切呼吁老一辈作家积极写作回忆录，把亲身的经历写下来，使这些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热切期望作家写自传，并号召文学研究工作者和作家的亲友为已去世的作家写传记、小传，或评传”；还欢迎老作家访问记，提供老一辈作家日记、照片、手稿、墨迹等。

上述《致读者》及《征稿启事》，清楚地表明了《新文学史料》创刊的目的、宗旨和方针，这也是《新文学史料》第一任主编及其同仁们，在当时人们还心有余悸的情况下，向作者和读者的大胆承诺。

二十多年来，这本大型文学史料丛刊经历了几度政治风雨，在期刊激烈的竞争中，不改初衷，坚守阵地，尊重史实，发表新文学史料。从它面世到出刊 100 期，虽然其顾问、主编随着岁月的更替几度易人，可它的办刊目的、宗旨和方针却始终如一，而且方向越来越明，步子越来越稳，路子越走越宽。还让人感到它在前进中，稳中有变，变中求稳。如栏目设置，创刊号上就辟有“回忆录”、“访问记”、“传记”、“日记”、“轶闻轶事”等，到了第 100 期的刊物上，这些栏目依旧故我。根据稿源的实际情况，一些栏目设置又在不断地变化，

逐步走向了完善，如“怀念×××”、“鲁迅研究”、“作家资料”等，逐渐变成了“××专辑”、“作家与作品”，而“日记”、“书信”、“札记”又统归为一个栏目，使栏目设置更富科学性，内容也更丰富起来。可见，《新文学史料》编辑们编辑这份大型文学史料丛刊是在遵循史料真实的原则下，根据当代学术思想发展实际状况，在栏目设置上，选编稿件中又努力做到与时俱进。稳中求变也好，变中求稳也罢，刊物一直遵循着创刊时向读者、作者承诺的办刊目的、宗旨和方针前进。不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其他刊物如何花样翻新，它依旧走自己的路，按既定方针选稿、出刊，既不跟风向转，也不追求所谓时尚，更不媚俗。就看它的封面设计吧，从创刊号到第100期，始终都是二三十年代几种影响较大的期刊封面缩印的排列，只是每期颜色有所变化，给人一种深沉而真实的历史感。这正符合刊物的内容。这种崇尚学术、以不变应万变的办刊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新文学史料》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根据“双百”方针提出后几十年贯彻实践情况，编者在创刊号上的《致读者》中这样写道：“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观点上不强求一律，作者可以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去回顾、叙述、分析这个时期的一切文艺现象，自由地发表意见。”这可以作为“双百”方针正确而简洁的诠释。几十年前，很多人都是这样去理解“双百”方针的，但有人提出了，或者照此理解实践了，不料却遭到批判或

斗争。批判者说：“百家争鸣”实际上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争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从此“百家争鸣”变成了“万马齐喑”，“双百”方针只流于口号而已。而《新文学史料》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真正贯彻执行“双百”方针。这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收获，表现出《新文学史料》顾问、主编和编辑们的远见卓识和气魄。编辑部不仅态度鲜明地提出如何真正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也积极努力实践了。如在总第37期上的“来信照登”栏里，就一字不易地发表了姚雪垠的《请澄清史实》的信稿。姚雪垠在这篇信稿中不仅措词尖锐地指名道姓指责了李蕤，而且还一口一个“你们”、“你们”地质问《新文学史料》编辑们，说编辑部发表李蕤的文章^[2]，“有悖编辑工作的慎重态度”、没有“起码的严肃负责态度”、“不执行编辑的起码责任”、“违犯编辑惯例，随便发表损伤我的名誉的文章，难道你们不明白要担负法律责任？”他要求将他的这封信稿在《新文学史料》上“原信照登”。《新文学史料》很快就将此信稿一字不易地“原信照登”了。这不仅表现出《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民主办刊的大度，也体现了中国文人传统的涵养美德，更重要的是显示其贯彻“双百”方针的坚定性。又如总第66期“来信照登”栏，刊出的蒋祖林信稿，指出由陈明整理提供的丁玲日记（题为《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3]，“与原稿不符”，“在文字上都有许许多多的修改”。他毫不含糊地批评道：

对待史料，应忠实于作者原稿。在内容上，不应随意修改和编造。在文字上若修改不当，也会影响史料的文字水平。原稿中明显误写的地方，如修改，应注明是修改者的意见。

我们知道，蒋祖林与陈明是继父子关系，按照我们民族伦理传统，蒋祖林似乎不应该在这样刊物上公开尖锐地评陈明，说陈明“随意修改和编造”丁玲日记。但是，为了史料的真实性，蒋祖林又不能不说自己该说的话，防止以讹传讹；《新文学史料》为了去伪存真，又不能不发表蒋祖林的这封信稿。可见，在这份大型丛刊编辑们看来，史料的真实是高于一切的。因为“史料”不同于“史论”。“史料”是理论研究、学术争鸣的基础，它是客观真实的存在，不能任人去随意打扮，更不能任人凌辱、随便作践；而“史论”是在客观存在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允许而且应该提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见，《新文学史料》作为全国唯一的新文学史料刊物，将史料的真实性放在选编稿件的首位，不因什么“关系”、“情面”而掩盖史料的真实性，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

《新文学史料》为了求得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从创刊号开始，还开设了“考证”栏目，从总第7期起，又增设了“补正”，尤其从第3期开始增设的“来信摘登”栏，不断刊出一些短小文稿、三言两语的读者来信摘登，对澄清一些史料的真伪大有裨益。如创刊号面世后，引出不少读者来信。于是在首期“来信摘登”栏，

一下刊出十几封来信摘编，对发表在创刊号的茅盾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冯雪峰遗稿《郁达夫著作编目》、常久的《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等文章中的误记、疏漏之处，予以订正和补充；还有陈学昭、钦文对自己发表在《新文学史料》第2期上的回忆录《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出国》、《鲁迅和陶元庆》的更正，等等。这些信稿，从多方面补正了新文学史料，使这份大型文学史料丛刊所刊史料更真实、更详尽，防止了以讹传讹。这种以对历史负责、对子孙负责的态度，抢救了第一手鲜活的真实史料，实在是功德无量。

编者在开辟“来信摘登”栏目时写道：

本刊第一辑出版后，收到许多热心读者的来信，对一些文章中涉及的某些事实，提出了订正和补充。对此，我们非常感谢。

《新文学史料》的主要目的，是为文学史家们提供尽可能翔实的资料。但是许多人和事实的论述，主要靠当事人的回忆，而时间久了，难免有误记和疏漏之处；又因当事人受到有如所处地位及观察角度等限制，也难免有看得不全面的地方。这就需要了解情况的人相互参证，以求得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

因此，本刊所刊出的文章中如有与事实有出入或不足之处，欢迎有关人士及了解情况的同志来信加以订正和补充，我们设立“来信摘登”一栏专门

刊登这些来信。为了节省篇幅并开门见山，本刊原则上省略信前导语，以便留出篇幅更充分地披露实质上的内容。^[4]

从这篇编者的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新文学史料》作为文学史料刊物，它的编辑们为了使其刊出的文章中所提供的史料能达到“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真诚期待“了解情况的人相互参证”。当然，这也体现其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

三

二十多年来，《新文学史料》出版了100期，所载文章为读者提供的丰富珍贵史料，不是简单而抽象地叙述历史事实，而多是形象生动地向读者传授文学史料，有的文章还有较强的论辩性。因而，这些文章对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具有可读性，令人读来兴味盎然，深受感染。如茅盾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路》，我们读后不仅可以了解“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三十年间的文坛概况，还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风云，以及作者在这些政治风云变幻中的思想变化轨迹。如《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就写了“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北洋政府的丧权辱国的外交，北大教授主持《新青年》鼓吹新文化，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到上海等地讲

演，各地学生成立联合会，以及茅盾自己这个时期的思想变化。他说：“两年后（注：1921年），我自己也投入了这个洪流。”由于他思想受到了新文化的影响，才积极革新《小说月报》，因而与鸳鸯蝴蝶派“结下了不解深仇”。我们读后更深切地了解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兴起的，茅盾又是如何参加的。读过《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我们便可具体地了解到“五卅”惨案的真相以及顾正红牺牲的较详细的经过等。《新文学史料》陆续登载的冰心、巴金、老舍、沈从文、姚雪垠、张恨水、闻一多等老一辈作家的回忆录或传记，也都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角度，写出了新文学发展的概况及作者的心路历程。还有秦兆阳在他的《回首当年》^[5]里，饶有兴味地介绍了他的名字“兆阳”是与生俱来的。中国新文学家多有笔名，有的人还有几个、几十个笔名，而他除了一个例外——1956年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用了“何直”笔名，——到老都只用“兆阳”。在这篇回忆录中，秦兆阳还叙述了他的鲜为人知的恋爱故事。又如从前述姚雪垠与李蕤之争中，还可看到中国现代文人的另一侧面。

这些老作家的回忆录、传记等，除给后代留下弥足珍贵的新文学史料以外，还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因为它们多是出色的报告文学。如茅盾的《我走过的路》，开篇写他当年进商务印书馆的情景，就非常简洁生动，有声有色。他手持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的介绍信，去上海商务印书馆找张元济（菊生）总经理（商务

印书馆创办人)：

……我刚到楼梯边，就有人拦住，问，“干什么？”我答：“请见张总经理。”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冷冷地说：“你在这里等罢。”我真有点生气了，也冷冷地说：“不能等候。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一听“孙伯恒”三个字，那人立刻面带笑容问道：“是北京分馆孙经理么？”我不回答，只从口袋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那人的笑容更浓重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我慢慢地走上三楼时，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的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是等候传呼然后可以上楼的。我心里想，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将如何？

到了三楼……一人坐在长方桌后，见了我，就说：“先登记。什么姓名？”我答：“沈德鸿。”那人又问：“三点水沈，是么？什么得？”我答：“是道德的‘德’。”又问：“三点水共字的洪罢？”答曰：“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那人睁大了眼，此时忽听有人说：“是江鸟鸿。”……登记人皱着眉头说：“江鸟鸿，人人都懂，你偏不说。干什么事？也得登记。”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大信封来。登记人接过去一看，霍地站了起来，口里念道：“面呈总经理张台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这个墨笔写的“孙”字恰恰写在红色印的“馆”字上

面。登记人满面笑容对我说：“我马上去传达。”推开门进去了。

其实，茅盾见了张总经理，觉得张总经理很亲切、很和蔼，一点官架子或大老板派头也没有。“我回想总经理的办公室，朴素的很，墙上不挂任何字画，大写字台对面的长几上却堆着许多书报，中、英文都有。”

茅盾的这部长篇回忆录，显示其著名文学家的大手笔。语言简洁、生动，饱含深情，三言两语就勾画出人物性格和典型场景，透视出民国初年人际关系、人情冷暖。这些都给读者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文学味，引人入胜。

许多新文学老前辈和老作家的长篇文学回忆录，都生动形象地描画出一条条历史隧道，读者穿过这一条条历史隧道后，得到的是清晰的历史脉络，沉甸甸的历史感。

长篇文学回忆录如此，而大多短篇文学回忆录简直就是报告文学中的特写。它们将一段史实或一个史料片断放大，让你读后犹如身临其境，不觉回到过去的历史情境中。如陈竹影的《忆佩弦》^[6]、高真的《一多牺牲前后纪实》^[7]。前者以平实的笔调，将朱自清从学生时代到1948年逝世前夕的生活、思想、写作，浓缩在一篇短文中，真实地表现了朱自清“在旧社会是一个有强烈正义感的、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他有鲜明的爱憎，但勇气不足，只能“在歧路中彷徨”；他亲身经历了“三一八”惨案后，奋笔疾书，写下了《执政府大屠杀